

罗浩鸣获奖情况·成果交流论文

乡村的落败与复兴之路

罗浩鸣

摘要：乡村是中国沿袭了千百年的社会结构之一，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推进，不少的乡村却正在衰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落魄。乡村为什么会衰败？乡村还需不需要复兴？如何复兴乡村？是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分析《乡土中国》与现代乡村问题基础上，以点带面对乡村复兴做出了一些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乡村现状、社会结构、家族观念、道德法律、乡村复兴

一、引言

乡村在费孝通笔下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费老的乡土社会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乡村鸡犬相闻、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一切秩序井然、欣欣向荣。

进入新世纪，乡村却在悄然改变，曾经充满生机的乡村，现在正在逐渐落败，有的边远乡村甚至已经消失。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 2012 年 10 月 20 日透露，2002-2012 年十年间，中国 360 万个自然村已“缩水”至 270 万个，“每天消失八十至一百个村落，大量耕地、宅基地被废弃，留下的只有老人、妇女及儿童”¹。中国乡村正在空心化，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大潮下，曾经充满希望与机遇的土地和乡村，现在却出现了严重的物质、生机乃至精神的“荒漠化”。有的乡村已经消失成为历史，有的正在逐步走向衰败没落，这些仍然存在但正在败落的“空心村”将何去何从？边远乡村如何实现“中国梦”？目前脱贫攻坚战略精准扶贫虽然将贫困户迁离原来的居所，住到了乡镇聚居点，但这些农民仍然没有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还有少部分特困户仍“留守”原地，偏远乡村组织看似还在，但却人迹寥寥、土地荒芜、污染触目惊心。迁居安置的农民本质上还不能脱离自己的土地，但土地离聚居点却比较远——从来没有一个时刻面临像现在这样特殊和严峻的“三农问题”，乡村复兴迫在眉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我国当前重大战略之一。本文将从对比的角度分析当代乡村与《乡土中国》所代表的传统乡村，寻找乡村衰败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二、乡村的衰退和没落

相比费孝通笔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乡村，如今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乡村因各种客观原因抓住了发展机遇实现了持续的繁荣，而更多的乡村却在快速退化甚至消

[1]10 年间每天 80 个自然村消失[EB/OL] (2019. 10. 29) [2020. 2. 10]

失。2016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村级单位已缩减至60.37万个²，造成这种退化有社会发展的原因，有乡村管理模式改变的原因，有农业发展模式转变的原因，等等，这些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乡村逐步走向衰败。

（一）社会发展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乡村的衰落和退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宏观社会结构来看，中国乡村的退化呈现了两个特点：空心化与零散化。

大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农村开始出现空心化的倾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主要原因是1992邓小平南方讲话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大幅发展，接着是特区、城市对低价格劳动力有了极大的需求，这一需求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达到了巅峰，随之而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力的转移加速了乡村的空心化。乡村变成了“老人村”“儿童村”甚至空村、荒村，主要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原本完整建制的大多农村只剩下老人小孩和一部分妇女，社会结构勉强维持但生产力却在急剧下降，甚至已经“有村之名、无村之实”。

零散化则来自于千百年来广大农村大多逐族而居的家族观念逐步丧失。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家分为家族和家庭，前者结构相较于后者更复杂，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因为家族、家庭之间更需要团结互助，血缘又是维持稳定关系的最好纽带，因此家族结构大多不易变动，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村也逐步从大集体耕作调整为小组集体耕作，最后随着包产到户变为以家庭为团队的耕作模式，“大集体”生产模式完全瓦解，人们的大集体、大家族观念日渐淡薄，家族开始变得零散，逐渐解体从多辈分家族变为两辈分家庭，这使得原本沉稳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灵活，《乡土中国》中“不易流动的农村”变得更加松散，但农民（家庭）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大集体模式下的村、组的组织需求随之淡化。反过来，农村组织的零散化又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加快了乡村“被零散”的进程。

（二）乡村管理转变

传统大集体时代，村、组的核心职能是组织生产，包产到户后这一职能弱化，带来了乡村管理模式的变化，从核心管生产转变为管秩序、管治安、管集体经济等等，随之带来的是乡村管理方式的变化与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

乡村管理方式的变化从其代表——曾经根植于乡土社会的“长老权利”的变化中可见一斑。如今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遵从“长老权利”，长老（村长）的影响力早已不如当今网络信息对人的影响了。根本原因是“长老权利”更适用于“不变的社会”，也就是“长老”的经验更适用于可以重复利用而不易出错的社会，正是因为没有变化或变化小，所以过去的经验能够直接沿用，人们才会向有过类似经历的“长老”求助。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以来，世界变化飞速发展，传统的经验教训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

[2]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农业普查全国和省级主要指标汇总数据 (2016年) [EB/OL] (20161231) [20200210]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nypc/nypc3/d3cqnypchzsj.pdf>

会里不再适用，人们需要新的经验指导，“长老权利”自然被遗弃，延续千百年的乡村管理模式不再。

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乡村变化的另一推动力。在“发展”面前，农村、农民急于“富起来”，急于利用乡村资源的直接价值而忽视了其间接价值，急功近利的思维和观念甚至导致自然、民俗、人文等资源的急速破坏。仅有少数传统乡村、村落利用传统打造除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 IP，丽江、桃坪、萝卜寨等便是典型的案例，都是借乡村传统文化、自然资源开发旅游，为古老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三）传统农业没落

农业发展模式的变化是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土地弃耕是因为年轻劳动力流失，而劳动力流失是种地利益价值低，为了提升土地价值，农民受限于知识水平，更青睐于使用化肥农药提高产出效率，大量使用农药防止病虫害，而过量的农药和化肥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残、重金属污染导致农产品价值更低，更加加速了土地“弃耕”和村民离村进城务工。广大农村还存在生产生活垃圾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尤其是塑料污染，由于没有得到统一的处理回收，塑料本身又难以降解，休耕无期，对土地以及村民生活造成持续性的影响。

（四）农村厂矿污染

农村工厂对环境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由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加之技术设备落后、技术人才缺乏，农村“轻工业”包括小造纸厂污染、木材滥发等，农村“重工业”包括石材滥采、矿山滥挖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更极其严重，而且农村点多面广，监督管理难度极大，环境修复更是困难重重。

三、乡村的意义和价值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但总体而言农村的发展最不充分，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是农民。面向未来，人口价值提升、城市产能转移、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石都集中在广大农村，如何看待和提升乡村的价值，是中国社会能不能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

（一）乡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据统计，2018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 83137 万，乡村常住人口 56401 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 59.58%，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40.42%³，也就是说，中国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农村户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衰败的乡村是我国全面现代化的短板，乡村现代化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农业农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价值是保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关键因素。而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来看，如果直接抛弃农村，也就

[3] 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 2 月 28 日.

相当于抛弃了将近一半的人口，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从何而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农民富裕都是国家重大战略。

（二）乡村是转移城市过剩产能的蓄水池

因为农村教学条件差，农民受教育程度受限，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里做的都是最基本的体力劳动工作。但正是因为有这些劳动力促进了中国人口红利了的持续增长，中国制造业才会如此发达，以至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找到 MADE IN CHINA。但通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城市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当城市生产力过剩、城市内需乏力、城市商品市场饱和的时候，就不是低价劳动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振兴乡村，真正让乡村焕发生机，将催生出产能需求的巨大市场。

另一方面，在自动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人力终究会被机器所代替，到时候这些年龄老去、缺乏技术、没有工作后失去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者将何去何从？目前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已经不再适应体力劳动了，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员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农村，而复兴农村，就是保住他们的家园，将农村变成一个让人愿意回乡定居、能够较好满足生存发展的地方。

（三）乡村复兴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关键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用地数量大，年粮食总产量世界第一，可是中国更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量也是世界第一。全国 20 亿亩的耕地人均也只有 1.5 亩左右。人口基数大、务农劳力少、农村粮食产量低，自足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进口是填补粮食缺口的唯一办法。如果再不振兴乡村，农村耕地继续荒废，粮食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只靠进口办法补助粮食缺口是极其危险的。遇到特殊时期，如果他国不出口，我国自身准备有限，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粮食危机。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立足于乡村复兴上，通过乡村振兴带动农业发展，通过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整个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体系，才能尽可能地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粮食短缺的矛盾，为潜在的危机做好战略性的准备。

四、乡村的障碍和病因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⁴。要想复兴农村，必须找到障碍和原因，从根本上抑制其衰败没落，才可能找到可行办法。

（一）乡村振兴的障碍

经过长期的发展，在重城市轻乡村的思维定势影响下，乡村振兴遇到了一系列需要破除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虽然改革开放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创造了条件，但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⁵。流向城市的资源、割裂的城乡关系既

[4]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EB/OL]（20180510）[20200210] <http://www.rmlt.com.cn/2018/0510/518394.shtml>.

[5]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EB/OL]（20180510）[20200210] <http://www.rmlt.com.cn/2018/0510/518394.shtml>.

消减了农村的改革红利，又限制了乡村的发展。

乡村教育的衰落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由于农民进城流动，大部分的适龄儿童被带入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村学校“无生可招”，发展到最后导致农村大量的撤并学校，大集体农业社时代的一村一校变成了现在的多村甚至一乡一校，孩子们只能离开“故土”求学，客观上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加速了乡村的衰败没落。

此外还有撤村并组、异地搬迁、土地流转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找不到乡村的出路，步步被动退守的做法最终甚至导致很多的乡村再也“无法回头”。

（二）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欠缺

除了体制机制的障碍，直接导致乡村衰败的原因是乡村的三大要素——资本、劳动力与土地都在流失。劳动力流失最直接的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受到地理条件政策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生活物质水平平均低于城市，这就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农村子女通过教育走出农村，几乎都会选择到有更多机遇的城市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价值，潜在的人才也就从乡村流失了。土地的流失是与劳动力流失直接相关的，因为重要劳力流失，留守乡村的老人妇女不能全部担种地责任，只有竭尽所能去耕种，而未能顾及的土地只有大量抛荒，而且由于个人耕作的农产品与标准化生产的农产品相比没有价格竞争力，个人耕作土地的经济效益低，更加没有人愿意去耕地。土地的流失使得现实的农村与《乡土中国》中“以土为本”的农村发生了严重偏差。至于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⁶。”可见资本本性是逐利的。相比城市，农村可直接获利的资源极少，因此资本中用于城市的比重远高于农村。再者，农业的风险高、周期长、利润低，农产品价格低且不易保存堆积，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都有可能使得农业亏损，资本自然会从农村流失，导致农村失去发展和发荣的机会。

（三）乡村道德约束机制的分崩离析

在《乡土中国》中，道德是维系乡村秩序的重要因素，德治手段甚至优于法制。在传统乡土社会，道德被描述为界限模糊的存在，与区分明了的人际关系和法律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但道德的特点在于主观、自主、低成本，道德治理所耗资源相较于法律低得多，因为道德是大众所承认的，虽然界限模糊，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统一标准而不会引起争议，因而在当时的乡土社会极具约束力。

在现代社会看来，法律是最低底线的道德，但法律的特点在于绝对化的标准和规范化的程序。同样的问题或案件，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德治只需要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处理即可，而法律却需要却需要繁琐的过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法律追求的是公正度、公信度。

[6]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年10月.

随着社会的进步，乡土社会沿袭了千百年的德治为主已发展为法治为主，因为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国策之一。在从德治到法治的改变过程中，开始是以德为主，逐步到德法共存，进而发展到法制缓慢取代德治。可是实际情况是这个过程进展得太快了，千百年沿袭下来的乡土道德、乡规民约等传统从在上世纪末短短 20 多年间就被取代。我国古代经典《礼记·王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⁷，习近平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上曾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政府治理不应轻易去改变本地传统的道德传统和生活方式。传统的乡土社会模式下，宗族长老拥有绝对的权威，维系乡村组织正常运转的就是道德和宗族秩序，这是乡土社会是自发、缓慢变迁的一种稳定模式。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也是人民的是自觉意识，但变迁是快速的，司法制度很快替代道德约束，法制秩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没有跟上，宗族秩序、道德约束的作用力倒是很快就淡化了。

（四）乡村家族价值观念的日渐淡薄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家族观念源自于人们对权利阶级与求同思想的认同，过去家族的强大意味着权利的强大，一个以血缘作为联系的集体本身就密不可分，在变化极小的乡土社会里更是没有分崩离析的可能，于是人们放下家庭融入家族。而且家族中的长者地位高、阅历广、经验多，能够为年轻一代提供建议。求同思想在家族观念的形成中表现为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上世纪梁漱溟先生总结中国人的人生意义说“所努力者，不是为了了一己的事，而是为了全家老少，乃至为了先人后代”，个人的荣辱是随时随地与家族相关的，家族中地位高者有职责提高家族地位，重视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个人对家族的义务，因此家族观念在旧社会和传统乡土社会一直都根深蒂固。

但随着社会大发展，建立于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以家族为中心的观念必然会受到冲击，家族观念已快要消失了。现代社会中家族被看做是陈旧封建的存在，而且家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族人的自由：大事小事都需要经过家族统一的讨论。在变化巨大且快速的现代社会中这样迟缓的组织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并且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威胁着家族的稳定，家族观念由此日渐衰败。家族的衰败伴随着的便是乡村的衰败，人们失去了家族统一的归宿，乡村政府与村民间也不可能建立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亲密的联系，人们自由程度高，不再受附于乡村，村民不断流出迁徙，乡村败落逐渐加速。

（五）乡村并非都是现代技术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大幅下降，但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在零散的农户处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农民或者乡村并非都从中获益，一些大型机械的价格和维护成本是个人或家庭根本无力负担的，更何况中国大部分山区农村地形不平坦，大型机器没有用武之地。真正获得利益的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随着一些大型涉农企业的发展，其机械化、规模化的种植和科学化、生态化的产品是乡村个人经营农产品无法与之竞争的，个人经营农业利益继续降低，没有人会为了微薄利益甚至劳而无获去耕种土地劳作，只有离开乡村另寻出路，乡村无法留人，只能任其荒芜衰败下去。

[7] 礼记·王制第五

五、乡村的未来和出路

当代中国乡村的复兴之路在哪里？

首先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的社会生活、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完善以及医疗、教育、环境治理、生态恢复……这一切都需要投入，只有解决了“钱”的问题，才能极大程度地解决了乡村复兴的问题。

以农场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也是一条可行之路——让少数人耕作大面积土地，把已经分到各户的零散土地集中流转承包给农场，尤其在人地广人稀、平原台地区域，大型机械就能够使用了，随之效率问题、效益问题、土地复耕问题、粮食产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采用方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不能忽视得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的人口基数问题，中国农村户籍人口 5.64 亿人⁸，而土地是有限的，全国粮食种植面积 17.56 亿亩⁹，本身人均耕地面积就不多，人多地少，要研究分配机制，保证大部分人都能够从中收益，还要保护零散农户在“农场体系”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复兴农村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资源，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都需要细心呵护。乡村没有像城市一样多样的资源，所以所有的乡村资源都要先保护、修复，再开发、利用，绝对不能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老路。现在通过乡村旅游业发展起来的乡村，都是因为科学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先例。

没有资源、没有特点的大部分乡村的复兴，除了扶贫、“引资”，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培养乡村人才，有人才的地方才会有发展前途，才会引领三大要素向农村聚集。受条件和资源限制乡村可能发展较慢，但相信只要守住家园的绿水青山，就必然也会迎来新的复兴发展的机遇。

六、结语

为什么要为了城市化而牺牲乡村？费孝通早年曾经思考过中国大幅度城市化的后果，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¹⁰”虽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乡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应该消失，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没有理由让乡村为城市牺牲一切。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忽视，乡村的历史意义不可忽视，如今放眼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彻底地放弃乡村及其文化，现代化的目的并不是消灭过去的痕迹，而是为了让历史与当下更好地共存，而且要竭尽所能让乡村更好地发展。为此，我们要重视乡土价值意义、乡土传统文化，为衰败没落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自觉承担其复兴乡村、复兴乡土中国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8] 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 2 月 28 日.

[9] 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 2 月 28 日.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2]陈桂棣, 春桃. 中国农民调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3]何晓龙.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根源[J]. 天府新论, 2018年第5期: 97-105.

[4]王君柏. 乡村已不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乡村振兴迫在眉睫[EB/OL] (2019.7.13) [2020.2.10]

https://m.sohu.com/a/326716437_100022487/?pvid=000

[5]许博渊. 家族观念衰落是必然[J].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2期: 47-47.

[6]陈功. 家族观念怎能被遗忘[J].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2期: 47-47.

[7]马克思. 资本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4月.